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 编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吴敬琏

信息经济学与范式变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罪恶是所有货币的根源

清泷信宏 约翰·穆尔

新比较经济学的新视角

詹科夫 拉·波塔

洛佩兹·德-西拉内斯 施莱弗

解读软预算约束

雅诺什·科尔奈 艾里克·马斯金

热若尔·罗兰

中国义务教育与公共财政

黄佩华 等

日本大学改革与独立行政法人

泽 昭裕

制度的历史分析

秦海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4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 编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第四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073-620-2/F·450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8208号

比较·第四辑

主 编: 吴敬琏

责任编辑: 肖 梦

责任监制: 朱 磊 王祖力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625 字 数: 207千字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3-620-2/F·450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010-85322522

卷首语

近期高频率出现的词汇是“与时俱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党的十六大把我们带进一个创新、开放、进取的气氛，这肯定是全中国人民乐见的。“一枝独秀”且好运连连，大家都乐陶陶的。不过，也有人对此清醒地指出，“样板戏”式的发展模式需要降温，地区间的不平衡要充分注意，贫富差距应引起足够重视，政府主导直接投资方式必须尽快改变，等等。正视现有的问题，探索解决困难和化解风险的办法，经济学界责无旁贷。《比较》秉承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之宗旨，连续向读者提供了一系列厚重的学术性理论文章。从读者反馈中我们获取了大量的“需求”信息，我们在此感谢读者对《比较》的厚爱，这是支持编辑者的最坚强的力量。在2002年结束之际，《比较》第四辑给读者奉上诸多领域的前瞻性理论文章，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做一个理论上的准备。

开篇吴敬琏的文章就指出，“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经济学家的队伍得到了自己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生力量的补充，但是，这支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要求愈来愈高，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在新一轮改革的春雷滚动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紧自己的工作，使得今后出现重大改革机遇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理论准备不够而手忙脚乱，或者因为仓促出台而招致大的偏差。”《比较》正是以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理论资讯为己任的。

本辑的“前沿”，我们安排了三篇文章，每篇都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方新论。头篇是在西方世界成为争议人物，在发展中国家被视为旗帜的斯蒂格利茨的诺贝尔颁奖发言的修改稿。他不无深情地说，“我走进经济学，带着它或许能使我为失业、贫困和歧视做些什么的希望。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人员，我已经幸运地偶然发现了一些思想，我认为它们提高了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作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我有机会减少一些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特别是关于现代经济学中的新信息范式和其他发展都对这些现象说了些什么。作为个人，我却因为没有使别人将这些观点付诸于实践而感到遗憾。作为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一名公务员，我有幸能够亲自从事这些研究。作为学者，我们有幸受到学术自由的保护。自由产生了责任：我们可以利用自由去做许多事，确保未来的世界将不仅拥有更加繁荣的经济，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社会公正。”本文追溯了一种范式替代另一种范式的轨迹，探讨由更为宽泛的议题所提出的特殊问题，以及从经济学思想史这一更广的视角提出的研究领域，讲述了信息经济学如何在流行的经济学范式中出现根本变化。

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清泷信宏和约翰·穆尔的《罪恶是所有货币的根源》对货币的作用提供了有别于传统的阐释，而这一阐释至少有两个重要贡献。第一由于其动态特征使之能够更好地融入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是以往如威克塞尔和近代如摩擦模型所不具备的。第二是通过引入具有时间属性的商品交换模型，目的虽在于为货币的存在做出理论解释，但是却突出了信誉和合同执行的重要，且使货币理论和法学巧妙地结合到一起。作者认为，“信任问题”是货币起源的基本，并且可以将之纳入货币理论，这样就可以在一个竞争性的框架内研究标准的宏观经济问题。

《新比较经济学的新视角》的作者由詹科夫、拉·波塔、洛佩兹·德-西拉内斯和施莱弗四人组成，近些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们或变换另一作者维什尼组成的四人组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以近百国家的调查数据来做某项研究的分析。本文中，作者以一个新的视角对比较经济学研究做了归纳与分析。传统比较经济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间的体制分析中展开的。如今，比较经济学正经历着一次复兴，新的着眼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比较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经济、政治一体化都对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如何管理其经济活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公有产权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对社会危害和外部性的监管；合同的执行以及纠纷的解决模式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竞争的制度安排上也各不相同，其中包括选举制度的结构、政治制衡的特点、司法程序等许多方面。不同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而这些差异又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比较经济学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解释经济绩效的差异，也可

以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设计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由科尔奈在1979年首度提出“软预算约束”以来，经济学界运用这一概念做了大量的探讨研究工作，现在“软预算约束”已成为经济学的常用词汇。本文是科尔奈、马斯金和罗兰对“软预算约束”研究的全面回顾与总结。最初科尔奈用软预算约束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以短缺为标志的一些行为，但现在软预算约束概念已广泛应用于转轨经济学领域，且已构成转轨经济学的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与转轨经济之外，软预算约束的空间也在不断拓展，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以软预算约束建立模型，来有效地解释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现象。我们相信，此文对所有有关软预算约束的正式理论文献的回顾，对大多数研究成果的解释，可以为读者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

第四辑的“法和经济学”栏目是皮斯托和许成钢接着第三辑的《不完备法律》的后三个部分：英国金融市场监管的发展；以比较的视角看法律的不完备性——以美国和德国为例以及最后的结论。作者提出的不完备法律理论，旨在探讨作为监管者的主动式执法结合灵活修改规则的权利，能强化执法。作者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英国金融市场监管的发展，以及其他法域包括德国和美国进行的比较。作者坦承，“本文仅仅是创建不完备法律理论的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将分析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激励问题，以及与不完备法律框架相关的政治问题。分配立法及执法权的各种不同方式，会对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激励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第I类型和第II类型不完备法律可以为腐败、寻租以及类似问题提供不同的机会。……在将来的研究中，我们会探讨在这些环境中立法和执法的其他可替代策略。”

世界银行在2001年委托财政专家组对中国的省级财政支出进行研究，主笔黄佩华教授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财政研究方面著述颇丰的美国学者，她的几篇文章都是海内外研究中国财税体制，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省与省以下各级政府财政问题的重要引据。在她的专家组形成的《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省级支出考察》指出，目前中国最值得关注的紧迫问题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状况。中国经济发展事实上是由地方政府贯彻执行，大约70%的公共支出发生在地方，其中55%以上的支出是在省级以下。现行的财政体系构成了目前中国实施改革政策的瓶颈，削弱了政策改进的效果，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报告建议，中国应进行涵盖政府间财政体系所有组成部分的综合性改革。本辑发表的是该报告中“义务教育”这一章。文章用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

部门经费短缺，而且过于地方化。省级政府对贫困县的补助薄弱且缺乏系统性。文章对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公共支出的公平、效率和效益有相当深度的评估。

我们选取了另一篇同样关注农村和财税问题的文章《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作者吴理财以安徽省为例，说明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在“比较之窗”栏目，我们向读者持续介绍日本“事业单位”改革的情况，日本自独立行政法人转制以来，大学也是改革的重要部分。作为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的作者，近年来一直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他认为，大学是否应该向独立行政法人组织形态转制，讨论的重点是理念的变革，大学作为支撑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机构，在组织、人事、预算等管理的各个方面存在着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通过向独立行政法人的转制，特别是可以在独立行政法人的概念所包括的各种自由度范围内进行自我改革，比形式上的转制更重要。

秦海的《制度的历史分析》是一篇关于制度经济学的很好的介绍，作者把“制度的历史分析”定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史和制度的历史研究。作者强调，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对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把握，使我们明白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位、思想脉络和发展趋向，同时它也是制度历史分析的思想基础。

目 录

第四辑

- 1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吴敬琏

前沿 Guide

- 11 信息经济学与范式变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aradigm Change

by Joseph E. Stiglitz

- 53 罪恶是所有货币的根源 清泷信宏 约翰·穆尔
Evil is the Root of All Money *by Nobuhiro Kiyotaki and John Moore*

- 62 新比较经济学的新视角
S.詹科夫 R.拉·波塔 F.洛佩兹·德-西拉内斯 A.施莱弗
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A First Look

by Simeon Djankov,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转轨经济

Transition Economy

79 解读软预算约束

雅诺什·科尔奈 艾里克·马斯金 热若尔·罗兰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by János Kornai, Eric Maskin and Gérard Roland

法与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97 不完备法律(下)

卡塔琳娜·皮斯托 许成钢

——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用

Incomplete Law

A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

by Katharina Pistor and Chenggang Xu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131 中国义务教育与公共财政

黄佩华 等

China's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Public Finance

by Christine P. Wong et. al

147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吴理财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163 日本大学改革与独立行政法人

泽 昭裕

176 制度的历史分析

秦海

现代经济学与 中国改革

吴敬琏

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经济科学对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的中国是否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对于不少实际工作者乃至经济学界中人似乎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观察，我想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

贬低现代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经济学不符合中国国情”。直到80年代，在我国改革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往往还会得到“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的讥评。

与这种思想相呼应，“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人们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我认为这个论断也值得怀疑。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逐步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于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从这个观点看，“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是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长期遵循这种战略，以一种“试试碰碰”的方式进行改革，只会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而且在彼岸目标为何物还不太分明的情况下，实际很难谈得上如何顺利过渡到彼岸。

纵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经济科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而在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

一、1956—1976年“不受学理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时，各个学派争奇斗妍，提出自己对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现象的理论阐释。可是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一切都改变了。秦王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从那时起，一切学问都要以对巩固皇权统治有害还是有利，有用还是无用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除了少量实用性的医药、农桑书籍，一概在禁止之列。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实用而轻理论的传统。

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本来应当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予极大的重视。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民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内斗争中又把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确定为教条主义，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片面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的思想倾向，就大大强化了轻视理论思维的风气。特别是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风气，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①，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

其实这种自以为可以不受经济学理论影响的作为的结果，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奴隶。”^②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工作一直是由毛泽东主席

① 见陈振汉、徐毓旂、罗志如、巫宝三、宁嘉凤、谷春帆：《我们对于当年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1957）。

② 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的意见所左右的。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演中，把从苏联引进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管得太多，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积极性，而没有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了整个经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开出的处方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毛泽东的这种想法和他引以自豪的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可以物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等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为基本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

“大跃进”造成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失是人所周知的。作为“大跃进”制度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放”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也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行政性分权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诸侯经济”，有别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古典计划经济的所谓“M型体制”^①，它固然使日后的乡镇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在经济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但是它所造成的资源配置大混乱却使“大跃进”、“高速度”所引致的问题大大加剧。为什么这些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到头来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要追根溯源，原因恐怕还在于当时的领导人完全没有经济学中“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概念，把“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现象看成问题的本质，企图在保持行政性资源配置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只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经济就会“一天等于二十年”似的飞跃发展。殊不知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与市场经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南辕北辙。结果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大灾难。

“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

① 参见钱颖一、许成钢《M型体制和中国经济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5期。

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虽然当时一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对这种改革战略提出了批评，但是即使这些先进的人们也因为缺乏足够的现代经济学的素养而没有能完全突破“调动积极因素就能实现多快好省”一类思维定式，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致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摒弃“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的“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的“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也导致了“条块分割”、地区保护主义等消极结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权”的做法，才对这种做法可能引致的问题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思路等逐渐失去了市场。

二、在新古典经济学支撑下的“增量改革”

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说它是“里程碑”，并不意味着它提出了什么具体的改革主张和采取了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而是因为它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始了鼓励理论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当时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较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分热心于读P.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十版)，进行了现代经济学的补课。在这种对于现代经济学再学习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了对于市场经济和它的各个子系统运作原理，例如价格机制的运作原理，宏观经济管理的运作原理等的框架性的认识，并且开始参与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因为是在长江的一条旅游船“巴山”号上召开的，又被称为“巴山轮会议”。参加这次历时6天的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J. Tobin)、

曾任英国政论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罗斯（A. Cairn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 Kornai）、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 Brus）、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行长埃明格尔（O. Emminger），中方的参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也有刘国光、戴园晨、吴敬琏、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经过会议对经济制度分类、宏观经济管理、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的深入讨论，与会中方人员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他们的经济学水平的提高，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政府恰当地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这时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很粗浅的层次上。当时，虽然20世纪末经济学的突破已经开始，但是我们不少人的认识仍然拘束在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的框架内。当时我们比较熟习的，是所谓“新古典综合”的某些结论，却往往忽视了它的假设。在完全信息、不存在交易成本等高度简化的假设下，产权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变成与效率不相关的事情。把由此得来的结论直接搬到实际问题的分析上来，就往往会造成重要的疏漏和失误。这些疏漏和失误包括：

第一，把计划和市场看成同质异形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以为两者可以无冲突地结合起来使用。在那个时期，比较经济学还处在以新古典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的“比较经济体制”（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发展阶段上。这种比较分析往往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的分布看成一张一端是纯粹的计划，另一端是纯粹的市场“光谱表”，其间则是计划的成份与市场的成份以不同配比结合在一起的各类经济体制；而改革则可以像在超级市场上选购商品那样，把计划和市场放进自己的经济体制购物篮子里，形成改革的目标模式。于是，许多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看作中国改革的目标，“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的想法和做法也变得十分流行。这些，常常使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变得模糊起来；而在实际的改革工作中，则表现为举棋不定，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这种思想的另一个缺陷，是在新古典模型的简单假设下，把计划和市场看作与制度无关的两种资源配置方法，以为不论制度基础如何，都可以在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任意选用，甚至以为可以把市场经济建立在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

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忽视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或者认为只要对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或“放权让利”,就能使国有企业重新获得活力。虽然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弄清楚股份公司的产权基础和与之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因而也就很难保证经过改革建立起来的公司具有效率。

中国幸运之处在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支持了农民的强烈要求,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农村的产权改革,让农民在从集体“包”(租)来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由此打开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在保持国有经济的体制基本不动的同时,进行“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s),使逐渐壮大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革新与

中国的“整体推进”改革

然而从世界范围看,这时已经开始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突破。阿克洛夫(G. A. Akerlof)在1970年发表《次品市场》一文,可以说是信息经济学走向前台的标志,而随后对科斯(R. H. Coase)等交易成本学说的发掘与深化,更表明经济学界普遍放开了新古典的完全信息和制度中性的假说,把制度分析提到首要地位。就我个人而言,在80年代初期读纽伯格(E. Neuberger)和达菲(W. J. Duffy)的《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在耶鲁大学参加蒙梯亚斯教授(J. M. Montias)的讨论课时已经开始感觉到,当把所谓DIM问题,即决策问题、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纳入视野时,制度安排问题就变得不可避免。当然,中国改革理论和政策的更大突破,还有待于80年代后期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更多引入。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掌握20世纪最后20—30年理论经济学发展的成果,推动了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的创新,例如企业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等等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

当经济学家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平台上就重大经济学问题取得共识,并以共同的努力来推进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易于获得顺利的推进。例如:

(1)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

专家的高度评价。人们也公认，根据这一设计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是我国改革中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大量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是就理论经济学和各国政策选择的最新结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7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亚尼（F. Modigliani）、斯特恩（N. Stern）、李国鼎（K. T. Li）、刘遵义（L.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2）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块“硬骨头”，我们曾在从1956年直到80年代中期以多种方式进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但是，由于没有抓住要领，总是劳而无功。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 Drucker）和如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国企改革进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才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 Hart）、米尔格罗姆（P. Milgrom）、麦金农（R. McKinnon）、刘遵义（L. Lau）、青木昌彦（M.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许成钢、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还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框架。

四、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

的经济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所有成就都是和经济学的进步分不开的。

然而也应当看到,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经济学家的队伍得到了自己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生力量的补充,但是,这支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要求愈来愈高,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在新一轮改革的春雷滚动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加紧自己的工作,使得今后出现重大改革机遇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理论准备不够而手忙脚乱,或者因为仓促出台而招致大的偏差。这里,我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管理学院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问题的深刻透彻的理解。纠正这种倾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打基础的重要性。

(2) 学科建设,重在形成惠风和畅、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和建立严肃、严谨、严格的学术规范。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改革所迫切需要的自由而切实地讨论的氛围和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良性竞争局面。

(3) 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①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由来已久的传统,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现在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给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贴上“为外国势力服务”的标签。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① 曹丕:《典论·论文》。